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採用了 Robert Jervis 的認知理論與安全困境理論，試圖分析認知因素對冷戰後「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影響。為了進一步瞭解這一影響的前因後果，本論文在第一章提出了三個問題以待研究：

1.冷戰結束後，「中」日雙方是如何看待對方的？與冷戰時期有何不同？此一認知的根源從何而來？受過去歷史影響的程度又如何？

2.隨著彼此認知的轉變，「中」日雙方在安全戰略上是如何界定對方的角色及地位？針對對方角色地位的轉變，「中」日彼此在態度和安全戰略上做出了什麼改變？

3.「中」日彼此之間在態度和安全戰略上的改變，對於「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乃至於亞太安全格局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

本論文嘗試對上述三個問題提出解釋，以下將分別概要整理本文的研究結果。

壹、中共與日本的彼此認知及其根源

關於第一個問題，本文的研究結果認為：中共與日本一方面將對方視為自身發展的助力，也認為雙方的合作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但另一方面卻又將對方視為安全上的威脅，在合作的同時也有意限制對方發展，其原因就出在歷史問題上。中共認為日本企圖否定侵略歷史，目的在使日本「普通國家」化；而日本則不滿中共不斷以歷史問題要求日本讓步，同時擔心中共企圖恢復「華夷秩序」打壓日本的國際角色。在中共強調「以史為鑑」的同時，日本則是強調「面向未來」。

從中共歷年來的對日文件可以發現，中共經常將日本政府的行為與過去日本侵華的歷史進行類比，並以其主觀期望來判斷日本政府是否「反華」。在冷戰初期「中」美對立時，中共認為追隨美國的日本是對中共有威脅的，因此對日本擴張防衛力量和角色的舉動就會賦予負面意義，例如日本強調台海安全對日本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就是「企圖恢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並以台灣為跳板，向東南亞擴張，重建『大東亞共榮圈』」；而當日本強化防衛力量時，中共就會指責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並認為自衛隊必然成為美國的侵略工具。但是當「中」美和解、「中」日建交後，中共反而認為日本防衛力是中共反蘇聯霸權鬥爭所需的，因此肯定自衛隊及美日安保的正面意義。

歷史問題並不單指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史而已，還包括日本處理戰爭問題時所留下的法律爭議，諸如台灣問題、釣魚台問題及南海問題等。中共認為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書，這些地方都應歸還「中國」，但因中國已經分裂，使得美日僅以舊金山和約的「放棄主權」模糊以對，這就為舊有的歷史問題製造出新的歷史問題。在「中」日建交前，影響雙邊關係的主要是舊有的歷史問題，也就是中共認定戰後的日本政府與戰前實無二致，日本並未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但在「中」日建交後，中共以《中日共同聲明》為依據，認定日本已承認侵華一事並表示深切反省，而「中」日間懸而未決的法律問題也已經處理結束，因此中共不容日本為歷史翻案，也不許日本做出違反「承諾」的行為。

「中」日建交後，雙邊關係並非一帆風順，但只要日本不去觸及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敏感神經，即使日本違反了所謂「承諾」，中共多將其視為個案處理而刻意淡化，例如 19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釣魚台問題即為如此。然而，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右翼史觀教科書經文部（科學）省審查合格等事件發生之後，中共便開始認定日本有意否定過去的侵略歷史，並再次認為美日有意聯手圍堵中共的崛起。中共認為日本政界在冷戰後呈現「總體保守化」的趨勢，

因此顯然放棄了建交前拉攏親「中」左派向日本政府施壓的策略，只是一味地譴責日本政府在為過去的侵略道歉的同時卻又參拜靖國神社，這種立場不一、否定歷史的舉動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這也使得中共對日本違反「承諾」的舉動更加敏感，例如美日安保將台灣納入「周邊範圍」，以及日本宣稱「尖閣諸島不存在主權爭議」等。

相較於中共經常訴諸歷史情感來評斷日本，日本政府顯然是以較為現實的態度看待中共。為了發展與中國大陸的實質關係，日本在追隨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同時也企圖避免許多法律責任，例如對台主權只有「放棄」而無明確的移交對象，以及將「中華民國」範圍限制於台澎金馬等；在承認中共的同時，也以《日華和平條約》有合法效力為由規避了戰爭賠償責任，並對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則以「日本已放棄對台主權，對台灣問題無權置喙」為由，僅表示「充分理解並尊重」而非「承認」。換句話說，日本恢復對中共的關係只是出於實際利益的需要，而非真心承認過錯，盡力彌補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這反映在日本的對「中」政策始終存在著「兩個中國」的現實色彩上。日本這種以現實利益至上的態度，正是歷史問題難以解決的根源之一。

在現實利益之外，歷史因素同樣也影響著日本對中共的認知。左翼勢力主張日本應對中共道歉，承認中共的「一中」原則，而民間也懷有對中國大陸的罪惡感及歉疚感，因而引發了建交後的「中國熱」，這是日本自我譴責、將中共視為友好勢力的一面。然而，日本同時也存在著對中共的負面觀感，這些觀感來自於中共繼承過時的中國天朝世界觀、中共對外戰爭的頻繁及中共對內進行反日愛國教育、在外交上頻頻打「歷史牌」迫使日本讓步等。左翼勢力在冷戰後已經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對中國大陸抱有親近感的日本人或者因為年老凋零，或者不滿於中共緊抓著歷史問題不放的態度而感到倦怠，這些因素使得主張重新審視歷史、凸顯日本歷史榮光的「保守民族主義」少了牽制的力量，中共與日本的歷史觀也越來越南轅北轍。

中共與日本的相互認知因為歷史問題而惡化，導致了錯誤認知的發生。首先，雙方有認知集中化的傾向，中共認為日本對歷史問題的態度倒退，有意美化侵略的過去，而日本則認為中共每每以歷史問題在日「中」關係上做文章；第二，雙方都高估自身影響的重要性，在關係好轉時總認為是己方政策奏效，而在關係惡化時就認為是對方的責任，忽略了己方行為的負面效果；第三，由於「中」日彼此的主觀期望和認知結果不同，因此都傾向於將對方的行為作出負面解讀；最後，雙方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都出現了認知不一致的現象。儘管兩邊都不乏有人提出警告，不要盲目地反對對方，但彼此敵意的提升使得雙方政府都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貳、「中」日安全戰略及相互評估的轉變

關於第二個問題，本文的研究結果認為：中共及日本都認為冷戰結束後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是區域衝突而非全面戰爭，也都把對方視為未來衝突的可能對手。中共認為日本企圖染指台灣及釣魚台，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及掠奪東海資源，日本則認為中共海軍企圖突破第一島鏈，日本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以及日本在東海的權益將受到嚴重威脅，為了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及海洋權益，中共的「積極防禦」戰略和日本的「專守防衛」戰略都有往「先發制人」方向轉變的跡象，這樣的舉動又進一步刺激了對方，導致彼此的不信任感持續升高，最後造成了「安全困境」的出現，影響到雙方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兩大主題為和平與發展，為此中共必須全力發展經濟，並以「新安全觀」、「和平崛起\發展」等訴求展現出中共的和平形象及國際社會的合作者形象，意圖消除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然而，經濟發展的目的之一為發展足以支撐國防現代化的綜合國力，為了因應未來「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以及美日安保等亞太安全複雜因素，中共必須改變其「積極防禦」戰略的內涵，強調「強勢防禦」和戰略進攻性武器的發展，進一步發展「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威懾能力、實戰能力和反應能力，國防現代化的重

心也放在海軍、空軍及第二炮兵上。

當前中共的海軍戰略強調「近海防禦」，防禦區域將從現行的第一島鏈逐漸往第二島鏈推進，並強調「敵進我進」的戰術思想，注重打擊敵後的能力，因此海軍需具有控制近海制海權和海上通道、在近海地區進行作戰及核反擊的能力。空軍則強調「攻防兼備、首當其衝、全程使用」，注重發展遠程機動作戰能力以成為獨立進行戰略戰役任務的軍種，在防禦作戰的同時發起「攻勢防空」，向敵方控制的陸海空區域或敵後縱深進行攻擊，因而必須擴大空軍作戰範圍及情報蒐集能力。二炮的核導彈部隊戰略思維則從攔截敵方核武的「最低威懾」轉變為具有第二擊能力的「有限威懾」，只要敵人發射核武，各部隊可不待武器落地即先行還擊。整體而言，冷戰後中共的「積極防禦」儘管維持著「後發制人」的精神，但更強調「制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注重戰略作戰能力及威懾能力，這使得「積極防禦」帶有攻勢色彩。

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以「和平主義」的形象參與國際社會，並以經濟援助為主要國際貢獻，在軍事力量的發展上則是自我設限，不但以「自衛隊」為名，更以「專守防衛」為原則，「自衛權」的發動也有嚴格規範。日本政府對「專守防衛」的定義大致如下：第一，可保有的自衛力量僅限「最低限度」，且不可持有戰略進攻性武器；第二，只有在面臨攻擊而無其他方法可以排除的狀況下才可發動自衛權；第三、發動自衛權的地理範圍雖不限於日本領域，但禁止前往他國領域行使武力；第四、日本基於國際法雖享有集體自衛權，但因憲法限制而不得行使；第五、超出自衛權的「交戰權」為憲法所禁止。

冷戰結束後，日本認為安全威脅的來源更為多樣化與激烈化，特別是亞太地區許多國家藉由經濟發展強化國防力量以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的成長，都使此區成為「不安定之弧」的一部份，其中以中共和北韓的軍事動向最引起日本關注。為了因應不確定的威脅來源，日本認為軍事力量的作用應從「國家防衛」拓展到「維持區域內秩序」和「全球規模的協調」，日本也應擴大在安全

議題上的貢獻，包括派遣自衛隊前往海外從事維和任務等。日本在冷戰時期的「防衛戰略」，已經被今天的「統合性安全戰略」所取代。

「統合性安全戰略」強調日本必須加強自身的防衛責任，強化與美國之間的協調以及與國際社會合作、善盡國際責任，其目標則為保障日本安全及改善國際安全環境。為了實現上述戰略，日本政府不斷透過統一見解擴大「專守防衛」的內涵。自衛隊的「實效性防衛力」要求的是更大範圍的情報蒐集能力和軍力投射能力，這就強化了自衛隊的攻勢色彩，「敵基地攻擊論」也讓日本的飛彈防衛帶有「先發制人」的內涵，「有事法制」和相關規定的修改也放鬆了自衛隊行使自衛權的限制。在活動範圍上，自衛隊的足跡則已隨著 PKO 和盟軍行動延伸至非洲及整個「不安定之弧」地區，而「周邊事態法」也讓日本對美軍進行補給支援時面臨到是否行使集體自衛權和「武力行使一體化」的爭議。日本為解決憲法與現實日漸脫節的矛盾，近年來積極展開修憲的議論，由於自民黨、民主黨及公明黨三大政黨基本上都同意賦予自衛隊明確的法律地位及權限，因此日本憲法第九條極可能遭到修改，日本將可望擁有完整自衛權。

中共與日本有共同的安全利益，那就是維持自身和區域的和平穩定及改善國際安全環境，這給了雙方在安全上進行合作的空間，然而雙方都不相信對方在安全上做出的承諾，為了自身的安全也都極力將安全緩衝區向外擴張，最後在東海、台灣等地出現重疊，一方的「防禦」很容易被另一方視為「侵犯」，最後造成了「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互信不足導致壓低不信任感成了「中」日進一步合作的關鍵，但雙方反而有逼迫對方讓步當「懦夫」的傾向，意圖獲取更大利益。唯有放棄這一動機，雙方才能真正攜手合作，例如中國大陸的「對日新思維」和日本的「贖罪意識」、反「中國威脅論」等，但雙方似乎都難以承受主動讓步的風險，而這一風險又因為「中」日的安全戰略及武器的攻守性質模糊而升高，只是防禦優勢限制住了雙方「先發制人」的動機，使得安全困境處於不易惡化、但也不易改善的局面。

中共與日本的安全困境明顯存在於在台灣問題或能源問題等個案裡。在台灣問題方面，中共與日本有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和短期內維持台海現狀的共同利益，但根本上中共視台灣問題為內政問題，而日本將其視為國際關心事項，加上台灣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使得雙方都不願在台灣問題上放鬆立場。在東海問題方面，中共與日本雖然都有「共同開發」的意願，但實際上卻是意圖藉由共同開發區的劃定進一步迫使對方在專屬經濟區的劃界主張上有所讓步，甚至不惜採取武力警戒措施嚇阻對方。在俄羅斯遠東油管問題方面，泰納線的興建已經是中共安大線與日本安納線角力下的妥協方案，雙方也都知道應避免過度競爭以免俄羅斯漁翁得利，但卻因為遠東原油儲量不明、可能難以滿足泰納線供應能力而引發「中」日之間是否興建大慶支線的爭議。

美國在「中」日安全戰略關係中的地位是值得注意的。「中」日之間的法律遺留爭議幾乎都是在美國主導下產生的，例如舊金山和約中日本僅放棄對台主權、釣魚台視同西南群島的一部份而由美國監管，其後則將行政權移交給日本等。在製造出一個不利於中共的安全形勢後，美國則以區域外調停者的身份介入「中」日安全關係中，表面上尊重中共立場，實際上則與日本立場一致。中共固然不滿於美國協同日本一起圍堵自己崛起，但卻又不得不正視美國在區域穩定中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儘管這一作用可能不利於中共的長遠發展。在中共「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對美戰略原則下，¹美國的「調停者」角色似乎頗能發揮功效，但隨著中共國力的進一步增長，「中」美能否繼續維持發展合作關係，美國能否繼續扮演調停者角色仍有待觀察。

參、「中」日間認知及戰略的轉變對雙邊及亞太安全格局的衝擊

關於第三個問題，本文的研究結果認為：認知及戰略的轉變，導致「中」日安全戰略關係形成了競合關係，這樣的關係不僅存在於兩國之間，還波及亞

¹ 楚樹龍，「中美關係：穩定壓倒一切」，*環球時報*（北京），2006年4月19日，第11版。

太地區。一方面，隨著雙方綜合國力的增強，對區域事物參與度的深化，中共與日本都有展現大國能力，共同主導亞太跨國合作和區域整合的意願，但另一方面，雙方又因為不信任感而有意在區域合作中淡化對方的作用、突出自身的地位，亞太國家也利用「中」日間的競爭心理意圖從中得利，使得區域整合基礎原本就較為脆弱的東亞合作更難以進行。

在東北亞方面，為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維持東北亞安定而形成了「六方會談」機制，中共與日本皆參與其中，共同保證北韓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及對北韓的能源、經濟協助。中共希望北韓與美日建交，將北韓納入國際體系中，促成朝鮮半島無核化，而美日則希望中共擔任仲介者角色，協助緩和與北韓間的緊張關係及消除北韓的安全威脅，這是中共與美日間的合作基礎。然而，美日希望北韓先讓步，中共與北韓則是希望美日先讓步，為了強化自身立場，中共及美日都將南韓視為可以爭取的目標。南韓在政治上與中共的友好程度超過日本，但安全上則有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和與日本的準同盟關係，這使得南韓在安全問題上可能還是會選擇偏向美日，東北亞形勢也將重回冷戰前期的對峙局面。

在東南亞方面，中共與日本皆積極參與以東南亞國協為主體的區域合作對話機制，同時認為唯有共同分擔主導權，「東亞共同體」的理想才可能實現。「中」日雙方共同參與了 ARF，推動信心預防機制和預防外交措施，並針對區域內政治安全情勢進行意見交換。然而，中共與日本在承認對方應有共同主導權的同時又有意突出自身主導地位、將對方貶為從屬角色，這就影響了 ARF 機能的進一步提升。日本試圖透過多邊機制發揮在東亞安全合作上的主導作用，但其進一步使 ARF 制度化的主張遭到了中共的阻撓，日本受挫之餘乃將維護區域安全的責任重新寄託於美日安保，意圖鞏固並擴大現存的以美國為中心的 hub-and-spoke 結構，同時希望擴大東亞共同體的成員以防中共獨大。東協國家一方面與中共合作處理南海問題，另一方面卻又各自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以

因應中共的軍事威脅，儼然以區域平衡者自居。中共與美日在區域整合機制上的各自為政，使 ARF 遲遲無法發展為有能力排除區域紛爭的安全機制。

台灣是亞太地區唯一無法參與多邊安全機制的國家，因此中共與美日的競爭對台灣的影響就更直接。台灣的民主化得到了美日的認同，也促成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成長，台灣政府乃以民主化吸引美日對台灣的進一步支持，並在安全上進一步倒向美日。這樣的戰略選擇改變了原先相對穩定的台海情勢，不但引起中共強化對台灣的「反獨促統」活動，台灣內部的泛藍勢力也擔心政府的舉動有「法理台獨」的可能而以國會多數優勢加以阻攔，並以造訪中國大陸來展現其具有促進兩岸和平的能力。泛藍一方面利用美日不願台灣片面改變現狀的心態向政府施壓，但為了不使台灣過度倒向美日也不惜在外交上衝撞美日，在泛藍可能重掌執政權的情況下，台灣是否改變冷戰後的一貫政策轉而接近中共引起了美日的注意。中共與美日在台灣問題上的角力不但讓台灣在外來壓力下無法對自身定位作出選擇，更造成了內部統獨認同的撕裂，使台灣陷於內耗，無力團結面對外部挑戰。

第二節 未來展望

壹、日本政治走向與「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未來

2006 年 4 月，日本讀賣新聞發表了兩份民意調查的報告，分別是關於對下一任首相的屬意人選，以及對小泉內閣五年來的施政滿意度。在論文的最後，筆者將試圖從這兩份民調來觀察「後小泉時代」日本政治的走向及對「中」日安全戰略關係的影響。

4 月 25 日，讀賣新聞公布了一份小泉政權五年總檢討的民調報告詳情。²在這份民調中，認為日「中」關係嚴峻的高達 72%，認為首相應對日「中」關係

² 詳細數據及評論請參照「小泉政權總括 改革 5 年、光と影 読売新聞社全国世論調査」，**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25 日，第 14 版。下文不再另行加註。

的嚴峻形勢負責的有 61%，然而，在是否贊成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贊成比例竟高達 54%，這反映出當前日本在對「中」思維上的矛盾。專攻日本政治史的東京大學教授御廚貴對此的分析為：儘管遭到「中國」的指責，但首相仍持續參拜，這讓國民產生一種爽快感；日本國民可能已經看破了一件事，那就是即便首相放棄參拜，中共仍會在其他事上做文章。這一評論與外相麻生太郎「即使解決靖國問題，兩國還有諸多摩擦，關係不可能立即改善」³的立場是一致的，可見日本社會已普遍認為歷史問題不再是日「中」之間的主要障礙，該解決的是其他現實問題，或者說光解決歷史問題是沒用的，在靖國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反而成了日本不滿中共不斷抓著這問題作文章的一種示威表現，這與中共以日本領導人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作為改善關係及進行領導人對話前提的立場⁴明顯是南轅北轍。

當然，不贊成參拜的仍有 40%，這表示日本人自己也不知該如何面對中共的歷史攻勢，這樣的困惑同樣存在於在自民黨下任總裁，也就是下任日本首相的競爭中。根據讀賣新聞 4 月 13 日所公布的民調顯示，現任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前首相岸信介外孫、前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之子）得到了 44.0% 的支持率，第二名的前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前首相福田赳夫之子）則為 13.2%，且差距呈現出縮小的趨勢。⁵以下將簡單比較兩人的「中國」政策以及民意的取向，來觀察日本未來的可能走向。

安倍晉三對日「中」關係的看法比較負面。他認為中共以反日訴求統治正當性是日「中」關係根本的癥結，日本只是因為自己的經濟深受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影響才不得不與其往來；日「中」友好固然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但現實卻是在犧牲日本利益的情況下維持友好關係。他還表示小泉之後的首相都應

³ 「『靖国』解決しても日中改善には時間」，**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16 日，第 4 版。

⁴ 「胡錦濤會見日中友好七團體負責人」，**人民日報**（北京），2006 年 4 月 1 日，第 1 版。

⁵ 「読売新聞社世論調査 『ポスト小泉』 『安』 『福』 差縮まる」，**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13 日，第 2 版。

該靜靜地去參拜，這不是要重返軍國主義之路，而是要表示日本將為區域和平盡到責任。⁶這似乎表示安倍將靖國參拜看成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如果日「中」友好必須以日本利益為前提，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安倍政權下的日「中」關係將不會有所好轉，只怕會更加惡化。

福田康夫則主張因小泉的靖國參拜而惡化的日「中」關係有必要改善。⁷他認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對日本並無加分作用，同時主張要承襲其父的「福田主義」，提出一個因應中共崛起的新亞洲政策。⁸「福田主義」為 1977 年 8 月福田康夫向東南亞國家所提出，主要內容有三點，分別是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要與東南亞各國構築「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賴關係」和以對等協助者之姿幫助東協各國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強化，促進東南亞的和平繁榮。⁹福田將「福田主義」與對「中」政策相結合，試圖以主動讓步的姿態以安撫中共、重新博得中共的好感，理論上有助於日「中」關係的改善，因此中共方面密切注意安倍與福田的支持率變化，並強調其「人氣直追安倍晉三」，間接表現出希望福田當選下任日本首相的態度。¹⁰

推動「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對於 9 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曾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如果候選人不是擁有自己的政策、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立不羈性格的話是拿不到票的。¹¹從中曾根的看法來觀察安倍和福田二人，安倍顯然比較符合中曾根所描述的勝利者，他不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有何錯誤，不認為日本有必要繼續道歉，也認為日本應該適時對「中」美說「不」

⁶ 安倍晉三，「中国にも米国にも『ノー』を」，*文藝春秋*（東京），第 83 卷第 10 号（2005 年 9 月），頁 98~99。

⁷ 「自民・福田氏、小泉首相の靖国参拝を批判」，*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1 月 18 日，第 4 版。

⁸ 「福田氏、総裁選に意欲 首相の靖国参拝を批判『新たなアジア政策を』」，*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

⁹ 中西寛，「第 4 章 自立的協調の模索—1970 年代の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2 年初版 6 刷），頁 173~174。

¹⁰ 「福田康夫支持率呈走高趨勢 人氣直追安倍晉三」，*新華網*，2006 年 3 月 27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03/27/content_4350439.htm。

¹¹ 「中曾根元首相 9 月の自民党総裁選 『小泉後継』では負ける」，*読売新聞*（東京），2006 年 4 月 29 日，第 4 版。

才能構築真正的友好關係，¹²可見安倍的主見相當強烈，不易受人影響。安倍的主張與民調對靖國參拜的看法大致相符，再加上他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因此除非黨內的反安倍派系能整合出足以擊敗安倍的力量，否則安倍的勝算將相當大，日「中」關係的未來也難以樂觀。

從以上發展來看，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難有解決的可能。中共始終認為歷史問題是「中」日關係的首要難題，其癥結在於日本首相持續參拜靖國神社，除非日本在這一點有所退讓，否則中共無意改善對日關係；然而，日本顯然對中共的歷史攻勢感到疲乏，在日本的認知中，兩國之間的現實問題比起歷史問題更加嚴重，光是處理歷史問題不足以真正改善日「中」關係，更遑論日本也反過來要求中共理解其歷史觀。可以說，中共不理解現在的日本，日本不理解過去的中國正是兩國關係陷入惡性循環的主因，唯有共同自覺身為大國的責任，展現大國風範構築雙贏關係，「中」日關係才有可能改善。¹³

貳、台灣在面臨「中」日競合時的應有作為

面對中共與日本的緊張關係，身為競爭焦點之一的台灣應該如何因應呢？就中共的經驗來看，一味地抓住歷史問題不放是沒有意義的。日本的確在二次大戰犯下了難以彌補的罪行，這樣的歷史是不能遭到遺忘的，然而人性是脆弱的，加害者未必能勇於面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甚至在面臨受害者的指控時會尋找各種所謂「證據」加以反駁，造成了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加害者否定事實的反應固然令受害者傷心，但過度地指責加害者亦無助於事情的解決，因此雙方各退一步是必要的，也就是當加害者雖然不願正視歷史，但有意彌補過錯的時候，受害者則適時放下仇恨，盡量去肯定加害者在後續彌補上的努力，如果雙方存在著共識，則將更有利於仇恨的化解。

¹² 安倍晋三，前引文，頁 99~100。

¹³ 三谷博、劉傑，「共に認識の落差埋めよ」，朝日新聞（東京），2005年4月23日，第13版。

台灣和中國大陸在面對日本侵略史的立場上有所同有所不同。在中共的教育下，中國大陸的人民只看得見日本可憎的一面，但是台灣並非如此。在冷戰結束後，台灣的歷史教育開始呈現出日本對台殖民統治較為正面的地方，例如農工業建設使台灣的現代化程度在當時的東亞名列前茅，以及台灣的教育普及度高於中國大陸等等。這並非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文過飾非，但日本總督府主觀上利用台灣資源的結果卻在客觀上促成台灣的進步，這其實給了台灣人一個以較冷靜客觀的態度去評斷日本功過的機會，如同東南亞一樣。

東南亞在二次大戰同樣遭受到日本的入侵，同樣因為日本而留下了許多慘痛回憶，然而日本主觀上企圖奪取白人殖民地支配權的作法卻在客觀上造成了東南亞得以擺脫白人統治而得到解放，從這點來講，日本又可說是對東南亞的非殖民化及政治發展有所貢獻的唯一大國，¹⁴加上日本戰後持續努力改善和東南亞的關係，使得東南亞對日本不愉快的歷史記憶逐漸消褪，並開始接受東協未來在政治與安全上可與日本合作維持區域穩定的觀點，在面對日本尋求「普通國家」化和在歷史問題上日漸強硬的舉動時反應也不若中共或南韓那樣的激烈，而是多半表示予以理解。¹⁵與中共相比，東南亞顯然較能正面看待日本在區域安全事務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並願意利用日本來制衡中共勢力的過度發展（反之亦然），因此東南亞的歷史經驗正顯示出受害者與加害者的相互讓步以及歷史觀相同的部分是促進雙方關係和緩所不可或缺的，台灣既已擁有後者，那麼如何妥善處理前者就是台灣今後所要面對的問題。

台灣在面對日本的歷史問題時呈現出兩個極端，一個是國民黨教育下形成的仇日史觀，一個則是在冷戰結束後經傳統親日派人士及對日本流行文化接

¹⁴ 謝志森 (David Chee Meow Seah)，「第3章 ASEAN と日本の東南アジア地域主義」，猪口孝編，*日本のアジア政策：アジアから見た不信と期待*（東京：NTT 出版，2003 年），頁 114~116。

¹⁵ Bhubhinder Singh, "ASEAN's Perceptions of Jap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sian Survey*, vol. 42, no. 2 (Mar/April, 2002), pp. 292~295.

受度高的族群所塑造出來的親日史觀，¹⁶這樣的極端態度導致雙方在面對日本時都容易犯下「見樹不見林」的毛病，因此筆者在本論文最後所要提出的建議就是：台灣固然不應過度仇日，但也不應過度親日，過度醜化或美化日本都無助於台日關係的維持。台灣要做的是「知日」、「友日」，唯有更加全面地瞭解日本，以不卑不亢的態度與日本交往，在以改善日台關係為大局的同時又能堅持台灣自身該有的立場，才是台灣在面對「中」日安全戰略關係惡化時的生存之道。

¹⁶ 學者何思慎認為，65歲以上曾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和年輕人之中的「哈日族」是台灣親日的主力，但受到兩蔣時期「去日本化」教育的影響，使得40~65歲的台灣民眾多半具有反日情結，學界更因此無法廣泛且客觀地建立起自己的「日本研究」，直到李登輝主政後才獲改善。見何思慎，「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與改善」，*亞太研究通訊*（台北），總第26期（2004年12月），頁82~83。